


刘洪潮 主编



怎样做 驻外记者

ZEN YANG ZUO ZHU WAI JI ZHE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国际新闻

怎样做

驻外记者

主 编 刘洪潮

副主编 赵雪波

金 勇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怎样做驻外记者 / 刘洪潮主编.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10

(国际新闻业务丛书)

ISBN 7-81085-428-3/K · 239

I. 怎… II. 刘… III. 特派记者, 驻外—新闻采访—基本知识

IV. G2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1427 号

怎样做驻外记者

主 编 刘洪潮

副 主 编 赵雪波 金 勇

特约编辑 秦殿杰

责任编辑 阳金洲

装帧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7 号 邮 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738557 65738538 传 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375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85-428-3/K · 239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新闻一直备受国内媒体重视。国际版在整个版面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国际新闻市场变得热闹非凡，国际版的优劣甚至成为评论一家媒体质量、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随着新闻竞争的日趋激烈，许多媒体痛感缺乏国际新闻报道的专业人才。年轻的从业人员和有志于这一行业的高校学子又因缺乏权威的参考教材而深深苦恼。另一方面，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有一大批干了一辈子国际新闻报道工作的老记者、老编辑、老翻译，他们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感悟亟待总结和传承。

正基于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国际新闻业务丛书——《怎样做驻外记者》、《怎样做国际新闻编辑》、《怎样做新闻翻译》、《怎样做对外报道》，希冀能以我们微薄之力，给众多从事或立志从事国际新闻事业的人留一份必读参考，为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科建设做一点基础性工作，为我国国际新闻研究领域填补些许空白。

在有些人眼里，驻外记者这个职业令人羡慕，走遍五湖四海，笔写大千世界，风光得很。这恰恰只看到驻外记者表面的欢乐，没体会到其背后的艰辛。甚至有人说，只要懂外语，国内记者就可以胜任国外工作！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初出国门，人生地不熟，一个驻外记者如何迅速投入工作、开展报道？在近乎残酷的国际新闻竞争中，如何采到独家新闻、发回独家报道？一个优秀的驻外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这些，都是我们深思、探讨，也令众多从未驻外的记者所疑惑的问题。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幸找到了一批声誉卓著的老记者、名记者以至新中国第一代驻外记者。他们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长期跋涉于战乱地区，奔波于新闻现场。条件险恶、环境艰苦不

说,有的在完成报道任务的同时,还兼负外交使命。在利益的诱惑前,他们坚持原则,毫不动摇;在战火的洗礼中,他们勇往直前,从不退缩。他们的精彩报道,深刻影响着国内外受众。

如果说驻外记者是骁勇善战的战士,国际新闻编辑则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媒体竞争的白热化,使新闻编辑由一个个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成为新闻大战中的弄潮儿。那么,作为一名国际新闻编辑,在信息时代究竟有何作为?又当如何作为?《怎样做国际新闻编辑》一书中,30多位来自全国媒体的资深国际新闻编辑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与教训,诠释着国际新闻编辑的角色和职业。每日海量信息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新闻背后的新闻如何解读?重大战役性报道如何组织?专题新闻如何策划?敏感问题如何报道?如何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类刊物中独树一帜,保留自己的特色?他们娓娓道来,把自己数十年的经验积累和盘托出,毫不保留,字里行间,显露出一个编辑所必备的气魄与魅力。

在国际新闻报道队伍里,新闻翻译一直不为大家熟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和国的国际新闻报道恰恰始于新闻翻译。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广播内容是“国内外主要新闻”。由于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我们还没有驻外记者,国际新闻报道主要是编译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外文稿件。

日月穿梭,60多个春秋飞逝而去。60多年里,新闻翻译不但架设起了中外沟通的桥梁,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决策参考信息,还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翻译家。他们中文功底扎实、外语能力出色。《怎样做新闻翻译》凝聚了30多位数十年如一日奋斗在新闻翻译岗位上的老同志、老专家,他们将告诉读者:新闻翻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一个新闻翻译者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如何夯实新闻翻译者的中英文基础?如何避免新闻翻译中经常出现的错误?怎样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相信这些都是新闻和外语院校的学生急切等待答案的问题。

对外宣传报道同样是国际新闻领域不可忽视的一环。宣传是一种

技巧，也是一门艺术。对外报道有何特点？对外报道与对内报道究竟有何区别？从国家的安全和根本利益出发，从世界和平的发展大局出发，我们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什么多报？什么少报甚至不报？《怎样做对外报道》将有理有据地阐释这些问题。正如书中各位专家所言，对外宣传报道中国，是为宣传自己而非强加于人，根本任务在于确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营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经验表明，方向明确，心中有数，才可站高望远，纵论天下，才可把握正确导向，立于不败之地。

不言而喻，外宣战线作为一个特殊战场和艺术领地，对人才的要求极高。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中国日报等是对外宣传的主力军。在《怎样做对外报道》一书中，来自上述单位的行家里手以自身经历和经验为对外报道工作把脉，条分缕析，给许多对外报道工作者和有志于外宣的青年学子指点迷津，传道解惑。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老一辈国际新闻工作者的经历早已成为历史。然而，他们的经验和感悟却化为结晶，沉淀下来，并将作为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流传下去，启迪后世。他们的经验和体会永不过时，仍然是所有从事国际新闻事业的人所遵循的圭臬；他们的品德和情操更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时光易逝，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有的已离开国际新闻工作岗位，年事已高；有的已是耄耋老人，风烛残年。时间刻不容缓，如再不抓紧将他们的经验留下来，那么，他们一辈子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就将随之而去，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国际新闻事业将蒙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这些人将留下永久的遗憾和愧疚。另有少数作者至今仍然在职。他们积极进取，业绩斐然，个个是搞国际新闻的行家。他们的经验同样宝贵，同样值得人们好好学习。

在采访、约稿的过程中，我们一次次被驻外记者们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风采所激励，一次次被编辑们锐意进取、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所打动，一次次为翻译们精益求精、锱铢必较的作风所折服。听到我们的写作初衷时，许多老同志很是赞同。有的老同志已经有20多年没有握笔了，有的卧病床上，有的甚至身患绝症，但他们都毫不推

却，毅然“受命”，有的还表示一定尽全力完成“有生之年最后一篇稿子”。他们是用心和血书写着自己人生最后华丽的一章，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感动之余，我们也诚惶诚恐，深怕自己在编辑方面的浅薄影响了他们的方家之言。为表示对老记者、老编辑、老翻译应有的尊重，我们在编辑时尽量维护原作的原风原貌、原汁原味。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老一辈国际新闻工作者丰富的经验、无悔的选择、高尚的操守让我们叹为观止。但我们同时相信，他们的感言必将作为路标和灯塔，为后来者指明方向，他们的教训也会随时给后人以警示。新时代的国际新闻工作者是幸运的。毛泽东说过，学习前人，以丰富自己。有前人的经验教训于此，后人必将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定有遗漏、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作者、读者谅解和指正。

编者

2004年10月

目录 | CONTENTS

- 1 前言
- 1 风尘仆仆五十年 (原新华社副总编辑) 彭迪
- 23 驻外记者生涯回顾与反思 (原广电部秘书长) 孔迈
- 37 在中东浪涛中学做一名“冲浪者”(原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陈佩明
- 50 我的驻外生涯 (原新华社副总编辑) 沈定一
- 68 青春热血献新闻 (原新华社代社长) 王唯真
- 76 从亚洲、非洲到南太平洋
——我的国外记者工作14年 (新华社高级记者) 李启
- 91 战斗在驻外记者岗位上 (原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 李翼振
- 103 驻外经历 永生难忘 (原中宣部外宣局局长) 高粱
- 121 风风雨雨十六载 (原外交部副部长) 王殊
- 141 我的“第一次” (原新华社副总编辑) 穆广仁
- 151 驻外生涯十二春 (原新华社副总编辑) 杨翊
- 164 在浩瀚海洋中“游泳” (新华社高级编辑) 朱敏信
- 176 只有坦诚 方得知心
——谈驻外记者交友工作 (新华社高级编辑) 关云秋
- 184 驻外记者采访技巧漫谈 (原中宣部外宣局局长) 王微
- 201 驻缅四年间 (原新华社副社长) 解力夫
- 213 驻外记者采访应该分门别类
——采访国际会议和做常驻记者、短期访问的体会
..... (原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万光
- 225 驻外记者的素质 (原新华社副总编辑) 姚云

- 238 驻外记者的调查研究 (原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 文有仁
- 259 业精于勤 行成于思
——驻外记者工作的一点经验 (新华社高级记者) 唐修哲
- 272 驻外记者要做不下岗的哨兵 (原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解聘如
- 288 新闻之外的功夫 (原中国证券报社社长) 任正德
- 296 我为中厄建交牵线搭桥 (原新华社国际部主任) 沈家松
- 304 驻外九问 (原新华社国际部主任) 杨 起
- 314 我在西亚经受考验 (原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社长) 唐继赞
- 330 驻外记者杂谈 (原《新华每日电讯》报副总编辑) 陈启民
- 346 “淘金记者”自述 (原《参考消息》总编辑) 余志和
- 356 西非战乱地区采访心得 (新华社高级记者) 郝章印
- 369 我在布达佩斯的记者生涯 (新华社高级编辑) 侯凤菁
- 379 在两伊战场经受锻炼和考验 (原《瞭望》周刊副总编辑) 许博渊
- 389 驻外经历和国际新闻采写漫谈 (新华社副社长) 马胜荣
- 399 我在法国做驻外记者的体会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郑园园
- 414 驻外记者：时刻准备着应对新挑战 (新华社国际部主任) 李红旗
- 429 调研是驻外记者的基本功 (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 祝寿臣
- 434 勇做富矿采掘人
——我在非洲做记者 (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 温 宪
- 452 宛如经历奇妙故事
——我的驻外记者生涯体会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丁 刚
- 463 驻外记者十忌 (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陈鹤高
- 473 采访苏联解体 (新华社副总编辑) 俱孟军

风尘仆仆五十年

彭迪



彭迪 1920年10月生，江西萍乡县人，新华社高级记者。1944年在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作为新华社最早和为时最长的驻外记者之一，先后在雅加达、阿克拉、伦敦、华沙、华盛顿、渥太华、哈瓦那、日内瓦和维也纳等地度过50个春秋。1979年4月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记者常驻华盛顿，担任新华社华盛顿分社社长、首席记者。1984年8月回国，担任新华社评论员。曾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

作品以国际新闻评论和通讯为主，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

初赴印尼 接受考验

1954年，正好是50年前，我第一次被派往国外任常驻记者。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找我单独谈话说：我们想派你去印度尼西亚常驻。这是我国首次对印尼派出记者。它是一个重要国家，不久可能在那里举行亚非国家首脑会议。

我听了既兴奋又茫然。我对印尼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也不懂当地的语言，正在考虑是否能胜任。冷西同志看到我似乎有些犹豫，紧接着说：“社里向中央提了三个候选人，最后（周）总理挑选了你。”

这话分量很重，我立即表示服从决定，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

冷西还说：“钱行（我的战侣）这次不能同你一起走，因为你们都是对外部的骨干。同时要抽走你们两人比较困难。你先去吧，她稍后再来。”

这样，我单枪匹马来到印尼这个完全陌生的、不平静的国家。对外关系先不说，这个国家国内有左、中、右三种政治力量，势均力敌，处在一种微妙的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执政的苏加诺总统属民族党。右翼是以副总统哈达为首，包括马斯友美党和右派军队的保守派。左翼是广大群众支持的印尼共产党。还有二三百万华人，其中有亲新中国的，也有亲国民党的。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中国记者遇到的是如何处理好多种关系，首先是争取立足并逐步开展工作。

我找了一个旅馆住下。第二天印尼当局就通知我到警察局去一趟，没有说是为什么。来者不善，这是一个颇不友好的行动，但为了尊重驻在国的法律，不能不去。好在我来印尼的一切手续完备，而且还有中国大使馆坐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当晚我去使馆报告，大使同我一起做了研究，做了一些准备。第二天早上，我用早餐的时候，印尼当局又派一个人来找我：“你不用去警察局了，这是一次误会。”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也没有表示歉意，说完就走了。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印尼的华侨社会。一位华人朋友来旅馆看我。他说：印尼警方是受了中国国民党分子的影响。这次事件表明他们是企图来找麻烦，至少是发出某种警告的信息。我对他的说法将信将疑。它的确提高了我的警惕，因为如果不注意，我的言行可能授人以柄而陷于被动。

在这种心态下开始了我的驻外记者生活。除了忙于处理日常报道工作外，还争取同印尼各派系和不同社会阶层联系，广交朋友，既是为了多了解情况，深入报道，也是为了增加各界人士对我的理解和帮助。

大约半年以后，钱行也赶来了，分社的报道和社交工作迅速展开。不久总社又派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谭岱生前来协助。此外，我们还请了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华侨作者肖瑶璧为印尼文翻译。这个小班子，团结合作得很好，相处得也很融洽愉快。

我们那时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南洋旅馆我和钱行住的那间卧房的廊檐下工作。好在印尼气候四季皆夏，没有寒冷的威胁。还有一个好处，南洋旅馆（Hotel des Indes）是雅加达最好的旅馆，住了许多有

地位、有影响的客人，包括一些外国使节。这对我们的工作大有好处。例如，住在我隔壁房间的是加拿大大使馆的参赞。我们常常见面打招呼，有一次，他给我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内部新闻”。（后面详述）

我们除了充分利用当地的报刊和安塔拉通讯社的材料外，更多的是加强现场采访和建立社会联系，力争取得第一手甚至是独家的材料。从总统府到基层群众组织，都有我们的朋友或相识。有时还一大早到伊斯兰教徒做祷告的地方去，看到数以百计的教徒同时匍匐在地、同声祈祷的场面，不禁肃然起敬，也感到宗教信仰的威力，不可忽视。

我注意到，西方记者派去常驻的不多。塔斯社就派有一名常驻记者，但在许多场合很少见到他。对比之下，中国记者的报道工作，更加活跃，更能反映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政策走向。我后来回国时，吴冷西高兴地告诉我，塔斯社的负责人同他谈话中特别提到：“你们驻雅加达的记者报道得很出色，比我们强。”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谈不上什么出色，只不过做了我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如果说比较有一点特色的话，也可能是思想比较解放，敢于大胆负责，不受当时我国对新闻工作者的某些清规戒律的束缚。

举例说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规定记者要采访外国政要，要像外交官一样，得事前请示，甚至提什么问题都要预先报告。我见到印尼外长，对他提出几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印尼政府对越南形势的看法，他说得很好，我迅速发回总社。事后收到总社的指点，一方面说此稿切合时宜，已向国内外广播，同时又说，今后此种采访还是应该事先请示总社决定。这种限制现在当然早已取消，但当时要打破这种规定，是要冒一点风险的。

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的山城万隆举行。5个发起国对这次会议如何开、邀请谁，意见分歧很大。会前5国总理在位于西爪哇茂物的总统行宫举行预备会议，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是否邀请中国参加。我当时专程去茂物采访。会议是在高度秘密的安排下关门进行的。我只能在会外向各方打听，只听说会议争吵激烈，几乎不欢而散。会议闭幕的那天深夜，我找到了我在雅加达南洋旅馆住的那位

邻居——加拿大参赞。他帮了我一个大忙。这位先生可能同参加会议的某国人员有特殊关系，对会议情况了如指掌。会议快结束时他悄悄地告诉我：你们被邀请了。他说，强烈反对中国参加的是同美国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锡兰也反对，但比较缓和，基本上是中立的态度；印度虽然支持中国参加，但比较圆滑，不想得罪人；印尼是明确支持中国参加的，但它是东道国，只想把会议开成，不想把问题弄僵；只有缅甸态度最坚决、最鲜明，当会议几乎争得开不下去的时候，缅甸总理吴努发表正式声明，如果不邀请中国，缅甸将退出这次会议。缅甸这一行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会议终于通过决议邀请中国参加。

此事事关紧要。我星夜驱车赶回雅加达，通过我使馆，将这些重要情况报回北京。关于后来万隆会议本身的情况，许多人写了很好的文章，李慎之、张彦合写的《万隆会议日记》，尤其权威详尽。我只谈谈我们记者的活动情况。

会议前夕，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失事的悲惨事件。乘坐这架飞机从香港动身来参加会议的有我国新闻报道的主力军。他们遭敌特破坏全部遇难，其中包括我的领导和好友沈建图，还有黄作梅、李炳衡、杜宏等人。按原定计划，钱行也是准备乘这架飞机来印尼的，只是由于我工作吃紧，催请总社提前派出才免于葬身南洋大海。

悲痛之余，我们发现一夜之间，分社几个人忽然被推到第一线成为报道万隆会议的主力。而且很不凑巧谭岱生的脚病复发，痛苦万分，而且难以行走。但他勉为其难，承担了编发报刊和有关材料的任务，会议本身的报道就落在我和钱行两个人身上了。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是我们首次报道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会前两天，各国代表团先后抵达雅加达。为争取时间，我和钱行守在飞机场，一人一架打字机，代表团来一个，报一个。那时还没有电传设备，我们也没有电话线，我们的司机老李，一个忠实勤快、不会说中国话的华侨，来回奔走于机场和电报局之间，把我们的稿件送走发出。机场候机室许多人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紧张工作，没有其他国家的记者如此认真地对待这次会议。

当时领导我们记者工作的有黄华、李慎之。他们忙于代表团的工作，对具体会议逐日报道的工作只能靠我和钱行。我们缺乏经验，又人力单薄，只能勉强和低水平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忙乱中出了一些差错，只能算是一次练兵吧。

转战欧洲 争创特色

两年以后的1956年，总社派我和钱行去英国伦敦任常驻记者。这是一个同印尼完全不同的环境。这里各国记者云集，路透社、BBC的力量占压倒优势，英国大小报刊和其他各国通讯社和记者都不甘示弱，新闻竞争十分激烈。

我第一次去报道英国议会讨论。讨论刚结束，我走出议会大厦，脑子里还在盘算如何报道时，门口已经在出售刊登议会讨论的晚报了，这对我们的压力和刺激很大。我们中国三两个记者要和历史悠久、实力强大的西方通讯社拼时效和数量，不仅没有这种力量和条件，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有限的力量只能用在刀刃上，具体地说，就是抓住重点问题，争取我们的报道不仅有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独家材料，别具一格，当然也争取时效，以少胜多。

我很快就发现，许多有影响的报刊和某些小通讯社（如南斯拉夫的Tanyug）也是采取这种方针，既有自己的（加上别人的）材料，又根据事实作出自己的分析。西方人称之为“解说性报道”（interpretative reporting）。尽管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写法，同他们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总社当时在这方面没有具体指示，我们只好自己摸索出一条出路。

本着这种考虑，我们在伦敦的几年，除了许多动态性的报道外，更大的力量用在探索怎么能写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报道，争取在汪洋大海的新闻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这对我们来说是又一次练兵。

我们看到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如当时的古巴报刊不时登载了我们的报道。英美报刊一般不会采用我们的报道，但不等于说英国朝野不参

阅我们写的文章。我常听到他们对我的议论是“此人惯写烫手的東西 (hot stuff)”，看来某些报道还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957年，加纳（黄金海岸）——非洲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举行独立庆典，总社通知我从伦敦前往报道。这是我首次去非洲大陆，对加纳情况又是一无所知。我连忙在伦敦书店搜罗一本加纳民族主义领袖、即将就任总统的恩克鲁玛写的书。登上了去阿克拉的飞机以后，我才临时抱佛脚，集中精力阅读这本书。当飞机到达阿克拉时，天已大亮。我也刚读完此书，才多少了解一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轮廓。下飞机踏上这个“黄金海岸”时，我虽已通宵未眠，精疲力尽，但心里已感到踏实一点。

来阿克拉采访加纳独立庆典的各国记者不少，但我没有看到其他亚洲国家记者在场。我最后写的那篇加纳人民举国欢腾庆祝独立的通讯是中国也可能是亚洲媒体惟一的一篇。我自己也为非洲黑人的那种欢乐而感动，那篇文章虽匆匆写出，但也许可以说是中加人民友好关系发展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标志吧。

其实，我在伦敦的工作做得并不好。首先，报道重点不明确，英国不像小国，抓住一两个主题不放就能反映全局。那时，大英帝国虽已开始衰落，但百足之虫，衰而不僵，仍然是西方世界第二大中心，里里外外头绪万千。我更多的力量用在追逐动态，往往顾此失彼，因而扎扎实实的调研和纵深的报道少。

钱行在这方面做得更多更好。她肯用脑子、愿下功夫，采访中善于提问题，交往中善于交朋友，而且对中英文语言文字比较讲究。她写的《伦敦一条街》在国内曾引起很大反响，关于东伦敦的一系列报道也有一定深度，更能反映英国人民的甜酸苦辣。她的有些文章被国内有些中学课本选为教材。

此外，中国国内的政局变化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我们在伦敦的几年（1956年—1960年），正值国内从党的八大后转入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国内的宣传突然变得主观片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种政治压力波及四海，我虽然远在伦敦，由于缺乏实事

求是和明辨是非的政治水平和勇气,对英国的某些报道也流于主观片面,没有甚至不敢客观地反映实际。

记得1957年国内反右斗争进入高潮时,新中国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赢得的国际威望,突然急转直下,一落千丈。许多英国人,包括一向对中国友好的人士,对反右斗争都难以置信,替我们着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英国工党一位有影响的议员迈可·福特对我说:“你们国家威信很高,实力强大,国内有些人有些不同政见,怕什么呢?何必这样干呢?”对国内1958年一些夸大失实的报道,一位友好人士拉着很不以为然的调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们说的那些,我一个字也不信。”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本该是中国朋友的诚恳进言,我也没有勇气原原本本向国内反映我听到的种种善意批评。也许因此我逃脱了被划成“右派”的命运,但内心感到自己的懦弱,失去了一个新闻记



1972年,彭迪(中)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美联社社长加勒格尔。

者应该坚持的忠诚与表里一致。这似乎是题外的话，但在回顾记者曾经走过的路程时，还是应该记取的深刻教训。

1960年，我被调回国内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又被临时派出参加日内瓦老挝问题国际会议。这一次同万隆会议大不一样，中国派出了一个强大的记者团共20多人，以新华社为主，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的记者。中国政府代表团发言人吴冷西兼任记者团团团长，我是他的助手。吴冷西每天做完政府代表团的工作后，就来记者团坐镇指挥，和我们共同战斗。冷西要求新华社记者每天写一条述评，指定我和言彪两人轮流执笔。我作为记者团副团长，还要组织所有记者的报道安排和审阅他们的稿件，这对我是一次更艰难的锻炼。深更半夜，述评还没有写好的苦恼和焦急，特别熬人。最怕的是天快亮了，窗外的鸟叫了，文章还没有出手。回头来看，言彪和我写的一系列述评可能是我们比较成功的作品。虽然不免写得匆忙粗糙，但它们确实是被苦苦逼出来的。

在日内瓦参加会议期间，第一届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这是发展中国家反对国际强权政治的一个新兴运动。中国支持不结盟运动，但不是成员国，而且当时和东道国南斯拉夫是对立的，和最大的不结盟国家印度关系也不好。会议对中国会采取什么态度，还不清楚。北京派《中国青年报》记者吴学谦先到达南斯拉夫，并通知我从日内瓦去同他会合，再加上新华社常驻南斯拉夫记者杨翊，组成一个报道小组。众所周知，吴学谦是做外交工作的（后来担任外交部部长），这次更多的是来当观察员，实际报道工作由我和杨翊承担。

为了了解会议情况，会前我找了一些与会代表谈谈，其中有印尼代表团的正副团长——总理阿里·沙斯特洛阿米佐约和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他们是我在印尼工作时结识的老朋友。在他们下榻的旅馆中，我们重逢叙旧。他们介绍了这次会议的许多情况以及对会议前景的分析。在会议对中国的态度问题上，他们相当乐观，认为不会对中国不利。我也见到了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他认为我是能向世界传